

着项目走,按市场规律配置资源。但地方政府有考核压力,有税收考虑,有产业保护的惯性,有时候手一伸,就把市场信号扭曲了。

比如,知识产权跨区域保护问题,一跨行政区就容易扯皮。还有更深层的——财税分成机制。虽然比以前规范了,但隐形壁垒还是存在。我们调研中,有42%的科技型初创企业反映融资困难,近七成依赖自筹资金,“上海融资、江苏投产”的格局能不能真正打通?这背后反映的就是要素流动还不够通畅。

但也不是没有突破。一个积极的信号是“八市一区”已经启动了数据合作机制,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区块链技术协同、算力资源一体化调度。数据要素跨区域流通如果率先在这条带上跑通,那意义就非常大,可以说是为全国探路。另外,线上“沿沪宁协同创新集市”把对接从线下活动变成了“365天×24小时”的常态化在线集市,这个转型也很有制度创新意义——它让政府搭台但不唱戏,让市场的力量自动撮合。

此外,上海化工院在碳13同位素技术上有突破,通过共同体的机制,不仅联动了苏州、南京、常州的相关企业,还把这个项目成功落地到了安徽。这说明什么?说明只要机制活了,跨区域的项目合作是可以真实发生的。

《新民周刊》:这就引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——既然行政壁垒是系统性障碍,那破局的方向应该从哪里入手?沿沪宁产业创新带要真正向“世界级”迈进,您认为需要搭建一个什么样的制度生态?

王振:第一个维度是制度衔接。九个城市的政策标准、产业准入、监管规则,要逐步趋同。苏南几个城市被列为统一大市场建设试点,沿沪宁这条带就应该率先走一步。这不是一个城市能做的,需要有省市级层面的统筹。

第二个维度是平台共建。特别是战略科技力量的共享,这是最能体现“世界级”的地方。上海有三个国家实验室,苏州、南京现在还没有。能不能通过沿沪宁协同机制来破题?还有联合攻关的资金池问题——各地都

有对应财力,能不能整合在一起,统一决策、统一投向?我一直建议,沿沪宁产业创新带要争取“尚方宝剑”——参照G60的“部市合作”模式,在国家层面有工作机制和专项政策支持。

第三个维度是生态共育。营商环境不只是“办事快不快”,而是一整套创新生态系统。包括金融服务能不能跨区域覆盖——普陀提出“1+N”沿沪宁科创基金矩阵,这个方向对;包括人才互认——高端人才在九个城市间能不能统一认定、多点执业;也包括公共服务——我一直讲,同城化不是交通打通就够了,而是要把城市核心功能拿出来共享。

这当然有不少难度,但“世界级”不是靠一个“带”字,是靠一个完整的创新生态来定义的。这个“生态”需要在上述三个维度上同时发力。

《新民周刊》:如果以美国128公路、硅谷为参照系,我们目前存在哪些核心短板?到2035年,沿沪宁产业创新带最有可能在哪些维度形成真正的“世界级”竞争力?

王振:第一是基础研究的原创能力。美国那些科技巨头,底层技术是自己“长”出来的,我们的上市公司体量不小,但关键核心技术还有明显短板。第二是企业全球布局的能力。我们以前擅长把产品卖到全世界,但把产业链真正布到全球去,在全球各地投资,和当地融合,这个能力跟美国、日本的企业比还有差距。第三是文化层面的包容性和全球融入能力——你的人和你的企业,能不能真正适应全球化运作?中国的福建、广东、温州商人为什么能在世界各地扎根?背后有一种文化精神。长三角企业要成为全球化的企业,也需要培育这种精神。

但我对2035年是有信心的。在中国所有区域中,沿沪宁这条带实现“世界级”的条件是最好的。基础最实、人才最密、开放度最高。到2035年,我觉得应该建成、也一定能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业创新带。到那个时候,跨区域的统一大市场、一体化的创新生态、同城化的公共服务体系,都可取得重大突破。■